

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路径与模式分析

◆徐 永

摘 要 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发展路径的依附一度是其获得合法性一个主要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能够走到今天也有赖于此。然而,这种依附使得民办高校活在“别人的影子”中,未能形成自己的发展品性。表面看来,市场化的教育运作逻辑似乎彰显了民办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但“实用理性主义传统”让这种运作成了一般性的存在。在这种境遇下,民办高校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有的学校甚至陷入困境。所以,民办高校探寻自身的发展路径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关键词 民办高等教育;依附;教育模式

随着发展背景的转换,民办高等教育的模式创制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对民办高等教育而言,以往建基于功利化、粗放式、简单仿制等理念下的办学实践,势将遭遇“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挑战,也会使那些在“依附性悖论”下运作的民办高校陷入一种“范式陷阱”的境遇。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高校如何走出“依附”的“阴影”,开拓自己的发展路径已迫在眉睫。本文在述评民办高等教育现状的同时,就民办高校发展路径的拓展、发展模式的构建等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模式的因袭: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一)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背景的转换

从1982年的“宪法赋权”到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与实施,再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相关政策的出台,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制度化进程非同寻常。经过最初的“允许民间力量办学”,延展到今天的民办、公办高等教育共同发展的政策格局,民办高等教育办学实践的成效有目共睹。与此相对应的是,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也有了较大的转换。这种转换至关重要。毕竟,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伊始便深深嵌入到中国社会的转型之中,与经济体制改革几乎同步展开。市场化色彩

让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合法性依据,并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获得进一步的强化。然而,我们当逐步迈入“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却出现了萎缩迹象。具体表现为,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在社会脉络转换时,发展空间未能很好拓展,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瓶颈”。譬如,公共政策的变相歧视以及一度作为利用公共资源寻租结果的独立学院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空间的侵占^[1];又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自身的办学实践未能从制度化因袭(指民办高等教育的合法性路径是依附于公办高等教育模式下的存在)的窠臼中脱离出来。在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民办高等教育在由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环境日益严峻。基于此,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探究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诉求,如何在公立高等教育、独立学院的重重包围中成功突围,成为事关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前景的大问题。

(二)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的匮乏

改革开放至今,民办高等教育走过了30余年的办学历程,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以及社会影响力,但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催生出崭新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较之于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做无缝衔接”的姿态、相对于独立学院面向市场办学的形式,

徐 永/江西蓝天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南昌 330098)

民办高校并没有获得自己的发展路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民办高等教育有自己的教育模式。譬如,一种观点认为民办高校相对于公办高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办学实践更为灵活。但仔细考察不难发现,民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制约的,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同层次的公办高等教育机构。另外,就民办高校的办学理念和实践来说,将学校定位于应用型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也绝非是有着模式意义上的自我标示,它同绝大部分“面向市场办学”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基于此,一位拥有多年公立高校管理背景的民办高校的管理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民办高校始终活在别人的影子里”(指民办高等教育对公办高等教育生存模式的因袭)。在某种意义上讲,“非制度困境”(譬如由于适龄人口的减少,可能造成的生源危机)之外,民办高等教育长期依附于公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框架,压缩了自身的发展空间,陷入到了发展中的“制度困境”。实际上,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模式的因袭”一度是其获得合法性保障的重要前提,也是构建其“教育想象力”的重要源泉,然而随着时代背景的转换,这样一种办学姿态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诉求,“模式因袭”背后的“制度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办高等教育主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积极性和可能性。由此,在既定的社会脉络下,若要探究新时期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对这种“制度困境”背后所蕴藏的社会逻辑作比较深入的考察与剖析,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二、依附的悖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困境

针对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特征,学者邬大光曾有过比较精彩的论断:“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到今天,走的是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我国历史上的私学之路,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私立教育之路,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反映了民办教育在我国几十年‘断裂’之后重新复归的基础和环境发生了变化,折射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难以回避的一些矛盾,蕴含着民办教育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展的特殊问题。”^[4]他认为这种特殊性迥异于中外私立教育“捐资办学传统”的“投资办学体系”,已深深嵌入到市场化的社会脉络之中,导致中国

民办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义色彩”过于浓重,失去了它应有的“教育性”。基于这种整体性判断,民办高等教育同样也存在相应的问题。但是问题还不止于这个层面。如果我们换个视角,从整个高等教育运作的“消费主义倾向”去看的话,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特殊性又带有了普遍性的征兆。诚如有学者所概括的那样,“近年公共政策、特别是教育政策文本中,流行所谓‘表现主义’(performativity)、“工具理性主义”(instrumentalrationalism)或‘经济主义’(economicism)的修辞,它们把教育改革的争辩理据建基于学校教育所能带来的外界及工具性利益,更重要是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修辞的兴起及主导,代表着另一种教育修辞与理据的被边缘化,即以学校教育本身的内在价值、以学生人本为主的教育理念被压制。”^[5]由此可见,无论是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这种过度强调教育的“外在价值”忽视其“内在价值”的倾向,在市场化浪潮中主导了当下的办学实践。譬如,公立高校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利用公共资源兴办大批的独立学院,这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民办教育之经济主义特征实际上带有整体意义上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办、民办的趋同现象颇值得人们反思。表面看来,教育价值取向的趋同似乎是“公办”学习“民办”的结果,实际上其中还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我们从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审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就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运作的逻辑,还要在政治运作乃至社会文化的层面上考虑问题。基于此,考量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不能忽视中国社会“泛政治化的运作逻辑”。^[6]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泛政治化”的介入,使得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带有鲜明的依附性特征,并促使其在很大程度上趋同于公办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制造了“影子”背后的“制度困境”。

(一)民办高等教育依附性的表现

其实,上文所指涉的“发展模式的因袭”彰显了民办高等教育的依附性特征。如果我们深入到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及教育教学实践的一线去探寻这种依附性的征兆,将会有许多沉甸甸的收获。从教育理念层面上来看,当下民办高校自我标示的面向市场办学、面向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的应用型教育的系列修辞,并无学理上的价值。在实用理性主义至上的当下,非但一般的公立高校弃绝了象牙塔的精神追求,就是那些处处标榜着要“迈步跨进世界一流

大学行列”的重点高校也活在各种资本维系的社会氛围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之洪堡大学象征的“象牙塔精神”正如“远去的彼岸星空”,^[9]渐渐失去了感召力。从组织文化层面上来看,民办高校的组织架构和形式很容易给人制造一种迥异于公办高校的组织行为特征。事实上,剥去“类企业化运作”的外衣,民办高校的“官僚科层制结构”便会很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种组织结构几乎可以看作公办高校的翻版,而其精要之处并不在于组织结构的雷同,而在于组织文化的因袭。就维系高等教育运作逻辑的组织文化而言,过度的文化因袭无疑是阻滞民办高等教育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的重要因素。正如齐白石先生所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和组织文化,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也呈现出与公办高等教育趋同的迹象,尤其是与同层次的高等职业院校、独立学院、一般本科院校相比,这种趋同现象就更为明显了。这表现在民办高校的顶层设计、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培养路径等诸方面。在高等教育逐步迈入“后大众化阶段”的今天,亦步亦趋难以凝练出自己的办学特色和竞争优势,对于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办高校而言,无疑会面临发展空间萎缩的残酷现实,对此前文中已有所论及。

(二)民办高等教育依附性的成因

“依附”导致了发展中的“悖论”——由于民办高等教育依附于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这使得其在获得合法性依据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范式陷阱”,逐渐丧失了进一步成长的空间。以“制度化困境”为表象的“范式陷阱”将此等发展悖论发挥到了极致。大致来讲,一所民办高校的依附性越强、陷得越深,其发展的空间就越小,因为形塑这种“范式”的教育场是紧紧围绕着公办高等教育的,陷入公立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民办高校想要从中突围,找出自己的发展路径,那是难上加难的事情。那么,民办高等教育是怎么陷入这种发展的困境中的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1.民办高校的合法化进程。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早期轨迹来看,由于当时的合法化依据(譬如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不完善,涉及的层面也比较模糊)不够明朗,民办高校要想获得政府、社会、民众等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与支持,如何学习公办高校的办学经验,走正规化办学的路子,是摆在眼前的头等

大事。民办高校的制度化进程,亦是基于此等路径展开的。从政府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的姿态来看,如何将其约束在“中国式的高等教育的范畴”之内,这是其最为关心的事物,它从本质上并不愿意看到民办高等教育脱离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化进程,因为这意味着教育的分权和行政权威的削弱,这不符合集权式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利益所在。

2.民办高校的功利化设计。无论如何,功利化(市场化)的办学理念都需要民办高校在办学伊始能够择取最优化的路径,那么选择何种路径呢?首先,不能向前看,中华民国时期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已很难适应当下的社会情境,也与办学者的初衷不相符合,因此无法借鉴;其次,不能向外看,西方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固然发达,可其动辄几百年的办学实践以及独特的运作逻辑难以植入中国,即使勉强为之,也是难结果的花。由此,向前、向外的经验因袭模式均遭遇了“中国既定社会情境”的限制和约束,也与其市场化的办学理念不相容,由此,民办高等教育的举办者想要办好一所学校,就将因袭的目光对准了近在咫尺的公办高等教育,这也变成了最为合理、最为优化的选择途径。

3.民办高校组织文化的僵化。凭借着功利化的设计,民办高校在合法化的进程中逐渐因袭了公办高校的组织文化特征。这既表现在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层面上,也表现在组织与人的互动模式上。对此,我们不妨从大学叙事的视域下去考量民办高校组织文化的属性。基于一段时间的“参与式观察与体验”,研究者发现,在民办高校组织运作逻辑中,组织成员的叙事模式雷同于同层次的公办高校(笔者也曾以支教教师的身份,在公办高校呆过半年,对此有较深的体会),组织成员间叙事意义的偏颇与叙事关系的僵化导致组织中科层观念浓重,组织效率不高,也缺乏必要的“教育性”,在很大程度上变相承袭了政府行政治理模式,这与公办高校组织文化属性的内在结构是相一致的。由此,对于一个缺乏组织文化创造力,长期依附于它者的机构陷入到“制度困境”和“发展瓶颈”的遭遇就不难理解了。

(三)民办高等教育依附性的危害

由依附性带来的同质化倾向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危害甚大。由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以学费为主),拓展其它的渠道又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一旦其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就有被社会淘汰掉的危险。这样的危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能否正规化办学、获得各界认可的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是能否顺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潮流做大做强的问题,而在新时期则面临着如何从固步自封的办学困境中逃离出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民办高等教育的依附性存在使其在教育理念层面上失去了创造的空间,局限于狭隘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层面上。“民办高等教育等同于高等职业教育”是内隐于办学、教育理论工作者心中的“常识性存在”。面对这种状况,有学者直言不讳,“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公立学校的问题”,^[6] 俨然排除了民办教育乃至民办高等教育存在的价值。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必要性的丧失不仅仅是学理层面的无关紧要,从民办高校的办学实践上来看,由于其办学理念的功利化倾向浓重,“应用型”之外的路径从未有人进行过有效探索,这就使得当公办高等教育也以“应用型培养理念”为主臬的时候,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了。

民办高等教育的依附性在实践层面上的存在也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危机。实际上,由于社会风险和教育风险的存在,民办高校“面向市场”的教育姿态并非其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障。因为,首先“市场”本身所运行的经济逻辑同教育组织运作的逻辑是不同的。以专业设置为例,由于教育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完全按市场经济要求办学”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出的人才,未必就能符合当时的市场要求。市场本身是流变的,市场经济中的规律性的存在是不容易把握的,市场变动与教育的革新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物。其次,“中国式的市场经济”蕴藏于“泛政治化”的社会背景之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错综复杂,民办高校若忽略这一特征,便容易陷入发展的困境中去。由此,民办高校言必称“市场”的教育实践,其结果可能成为“市场淘汰机制”的牺牲品,这是值得警惕与反思的。

由于教育理念的因袭和贫乏,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教育模式的机械和单一化特征比较明显。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办高等教育有更好的教育模式,而是同样的模式放在不同性质的教育机构身上,很可能产生很不一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对于公办高校

未必显得那么重要,对民办高校而言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民办高校再想凭借着以往的低分优势、人口红利在未来的高等教育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已经越来越困难。无数的“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经验(包括欧美诸国,中国的台湾)都意味着,进入“买方市场”的高等教育赋予民众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加了,与之相对应的是,高等教育机构被淘汰的几率也大为增加了。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如何在新时期保障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基于此,面对民办高等教育的依附性带来的生存、发展危机,如何摆脱“同质化的范式陷阱”,探寻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和发展路径成为摆在民办教育者眼前的头等大事。

三、路径的生成:民办高等教育模式的构建

民办高校欲摆脱由于发展路径的依附性所带来的“范式陷阱”,在未来社会中求得生存,必须考虑构建自己的教育模式。但就目前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来说,不少民办高校的管理者的“教育想象力”被制约在“社会需求导向”的教育理念层面上。但正如前文所述,“社会需求导向”(即所谓市场导向、经济发展导向等)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事物。之所以需要警惕,不仅在于“社会需求涉及到的因素”本身有其不可捉摸的一面(复杂性),还在于它忽视了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反作用,倾向于将二者的“关系假设”界定为一种“静态、单向的适应关系”。基于这样的认知,被动的适应社会需求的教育发展路径成为民办高校办学的主导路径,这是其落入公办高校(中国的公办高等教育历来就有“实用理性主义倾向”的主因,这一点与市场化没有因果关系,而是深深内隐于社会脉络之中的,公办高教的“消费主义倾向”只不过是其“实用理性主义传统”的一种变式)营造的“范式陷阱”的重要因素。

从民办高校的外部发展环境来说,政策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赋权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民办高校惟有在理顺自身与政府关系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去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要理顺这样的关系,革新民办高等教育的治理模式是必需的。这样的发展诉求已经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相关的政策性表达予以彰显,而相关的试点工作也逐步在各省市展开。这样一种政策形成和扩散的过

程,除了需要政府部门的公共财政教育支持之外,对于公立高校主要就是一个“放权”的过程。相应地,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则是一个被赋权、增权的过程。根据这种政策导向,民办高校能否利用好政策表达和实践中利好的一面,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还需要从内部结构治理入手,进行观念的更新和实践的变革,改变自身长期依附导致的“发展瓶颈”,建构自我发展的模式。

1.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前文所述,我国民办高校组织文化的依附性特征,已使其内部治理模式“僵化”征兆。这种境遇就使得植根于“美国经验”的校董事会制成了“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尴尬事物。从世界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趋势来看,董事会制创设的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了高等教育史上(以美国为代表)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的构建,这种模式是独立于当时的公立教育之外的事物,具有开拓性的贡献(譬如,构建了捐资办学的传统)。既然我们在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的前提下,引入了此种治理模式,就应该让它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中开花结果,而不是名不副实。另一方面,基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现状,管理重心应适当下移,将更多地办学自主权下放给系部,这也是催生新的教育理念、教育路径的重要方式。毕竟,想要构建自己的教育模式,少不了中层管理者的参与和贡献。

2.多元化的发展策略及实践。用多元化对抗同质化,是民办高等教育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重要策略选择。面对以往办学实践中的依附性弊端,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发展路径的择取中要有“求异思维”。譬如,民办高校应该明确自己的方向与定位,直面办学实践中的营利性与公益性问题。非营利性大学要注重办学实践的“公益性”与“教育性”,营利性大学应学习与借鉴以网络教育为主的凤凰城大学(美国)的办学模式。总之,多元化的发展策略要求民办高校要突破“应用型的窠臼”,构建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分层次、分类别,有序竞争,科学发展。

3.关注高等教育的内在价值。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态势来看,关注高等教育的内在价值有着模式建构上的意义。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当下的教育发展多半建基于教育的外在价值上,教育的内在价值则停留在“以人为本”式的修饰中,甚少有人真正地去考虑高等教育自身之于个体生命的意义所

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民办高校围绕其“教育的内在价值”,展开想应的探索和实践,极有可能开拓出新的生存、发展空间,这关系到民办高等教育转型(由外延到内涵)的内在要求,也关系到民办高等教育生存。关于这个方面,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欧美诸国私立学院的教育模式值得借鉴。在美国的招生录取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非常值得我们的民办高等教育举办者反思——何以一个考生拒绝了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却选择了教学型的私立学院,它们的魅力何在,我们的民办高校应该从中学到哪些东西?

4.经验移植与本土化。虽然域外的经验移植容易沦落为“难结果的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学习好的办学经验和模式。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中,民办高校想要构建自己的发展模式,注重经验的移植(当然不能再走依附的老路)与本土化也是必不可少的。经验移植需要民办高校拥有世界眼光,从先进的教育模式中找寻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本土化则要求这样的移植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的社会情境和自身的办学实际,诚如英国学者陶纳所言,“除非土内生根,否则它不会成为活的教育。”^[7]由此,办具有世界先进理念的教育,办“活的教育”才有可能让民办高校在既有办学实践的基础之上,创立自己的教育模式,才能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营造更为广阔的空间。

四、结语

鉴于当前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情境不容乐观的现状,面对发展道路上是“重学还是重术”的“夹生局面”,^[8]民办高等教育模式的创制存在着不小的困难。从大的方面来看,无论是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东南亚诸国等发展中国家,东方文化圈中的私立高等教育的水平普遍较公立高等教育低,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逻辑和社会逻辑。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民办高等教育要想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获得新的发展路径,不仅需要不断的进行自我探索和实践予以保证,更需要发挥教育之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能动性。另一方面,教育模式的创制实际上意味着教育的革新,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承担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这样的制度环境和包容性?民办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和教育者有没有这样的实践力?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

话题。当然,面对民办高等教育改革与模式构建的各种风险,我们还需要站在历史的、未来的高度去审视与践行,突破“范式陷阱”。

(责任编辑 孙昌立)

注释

①“高等教育的后大众化”提法源于日本学者有本章。其在考察了日本 20 世纪 90 年代高等教育发展轨迹后归纳出这一观点。王洪才教授承袭了有本章的观点,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并非一个直线过程,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一个稳定期,此时高等教育发展并非继续走向普及化而是转向终身化,因此,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目标。”(见王洪才等,后大众化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3),134)学者冒荣等人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的中国特色,“‘后大众化’不仅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张,更预示着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环境及其功能结构的深刻变化。在这一新的时期,如何增进高等教育的效率,促进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见冒荣,宗晓华,合作博弈与区域集群——后大众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机制初析,《高等教育研究》,2010(4),36)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前一种观点着力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变革,后一种观点则是高等教育与外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是更为广阔的视角,这两种视角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后大众阶段即将到来的趋势和特征。

参考文献

- [1]王建华.我国独立学院制度:问题与转型[J].教育研究,2007(7).
- [2]邬大光.我国民办教育的特殊性与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07(1).
- [3]曾荣光.教育政策研究:议论批判的视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4).
- [4]徐永.文革场域下的大学组织病态权力研究——基于二元权力结构论的文本分析[J].社会科学论坛,2010(19).
- [5]冒荣.远去的彼岸星空——德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J].高等教育研究,2010(6).
- [6]劳凯声.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公立学校的问题[J].教育研究,2010(2).
- [7]转引自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81.
- [8]朱振国,等.新建本科院校入本科序列却面临困局,变“夹生饭”[N].光明日报,2011-04-13.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the Education Mode of China's Civilian-run Higher Education

Xu Yong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Jiangxi Blue-Sky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98)

Abstract: In order to earn legitimacy, it was one of the main strategic choices on the adherence of development path. In a sense, China's civilian-run higher education can go today, which depends on this. However, civilian-run colleges live in the shadow of the "others", failing to get their own development character. On the face of it, market-oriented education operational logic seems to reveal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ivilian-run higher education. In fact, it is a general existence because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s "practical rationalist tradition". In this situation, the living space of the civilian-run colleges was gradually squeezed. In the post-massification period of higher education, we need urgently to explore the topic on how to go beyond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to construct a new education mode.

Keywords: civilian-run higher education, adherence, education mode